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中华春秋

近代“夷夏观”传统思想变迁

□ 尹传政

“夷夏”观的形成

“夷夏”观，又称“夷夏之辨”，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念，并经历了由地理概念到文化意识的转化。经过先秦时代疆域开拓，便有了“中国”一词的地理定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中国”是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也就是周朝人统治的地域，他们自认为位于大地中央，对四方的民族居住地则称之为蛮、夷、戎、狄，正所谓“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到春秋时期这一概念出现了相应的异化，开始融入文化观念，如《左传·定公十年》曾这样描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也将“华夏”称谓定义为：“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这意味着，华代表汉服，夏指行周礼的大国，“华夏”就是“身穿汉服的礼仪之邦”。显然，从文化角度来讲，那就是“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被称为蛮、夷、戎、狄”。从此，这种“华尊夷卑”的文化优越意识长期主导了中国社会思想，并演化成一套“宗藩”体制且等级分明的思想体系，以此看待外部世界，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等。然而，这种“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在近代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发生变化，随之带来了中国社会层面意义的变动。

近代“师夷长技”思想的萌发

1840年鸦片战争在带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还冲击了中国传统“夷夏观”思想，打破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面对英国舰炮的威胁和开战的决心，部分士大夫抛弃“居天地之中”的传统思想，开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刺激了魏源对传统“夷”观提出了新看法。他在整编成书的《海国图志》中就指出：“夷蛮戎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徒，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贯穿今古者，是赢寰之奇士，城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他还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于是，他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仅有别于传统“夷夏观”思想体系，还反映了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思想观念。

“中体西用”的实践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也继续改变着传统“夷夏”思想。对于战败的结果，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技不如“夷”，“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样“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维护清朝统治为目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应时而生，一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西方进行技术学习的革新运动兴起。因此，在运动中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打着“求富”的口号创建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一批民用工业；建立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通过兴办京师同文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学校和派人出国留学培养了大量近代人才等等。

应当说，这场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但洋务者们始终无法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如洋务运动领导者奕䜣曾直言：“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扰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也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很显然，在这样思想指导下的技术改良运动很难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一些士大夫还是借中西交流之际对东西文明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突破了“夷夏”思想的认识界限。王韬重新解释了“华夷之辨”，他认为“华夷”文明是相对的，并提出：“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还指出了英国政治文明之所在，“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一致赞同），然后举行。”郑观应通过“夷夏”对比，道出了清廷封建制度的落后性，“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由于怀私，怀私由于行政专制”，并提出，“欲变专制，须开国会，设内阁”。可见，这场不成功的技术革新运动带来了更多新思想，为以后的政治改良运动创造了思想条件。

从“中体西用”到全面“维新”

以“中体西用”方式谋求挽救清政府统治为目的的技术改良运动最终由于甲午战败而结束，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在19世纪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很多士大夫真正意识到了国家民族面临的灭亡命运，“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他们开始批判“中体西用”的观念，要求深入的社会变革。如变法倡导者严复指出：“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这是因为中西文明有很多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王，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主张者康有为积极宣传西方的政治文明，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

于是，维新派发起了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全面学习的改革。在政治上兴民权，开民智，改良司法等；经济上提倡实业；教育上设立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等。然而，历史在演进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滑稽的一面。口口声声主张“开国会”“设议院”的康有为却依然信奉“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所以当顽固势力反扑时，这场维新运动便昙花一现。不过，这场改革运动还是在封建统治上层集团中引起了共鸣，并由此引发了对顽固派行为的不满。如李鸿章就表示：“太后临朝，诛遣十数人，大变新政，又成守旧世界。”显然，部分统治者认识到了清朝进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从新政仿宪到民主共和

虽然顽固守旧势力阻止了政治维新运动，暂时避免了手中权力的旁落，但还是无法阻止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革命潮流的兴起。面对八国联军入侵后留下的残局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荡，清政府当权者不得不自我解禁，重新走向社会改良的道路。如慈禧在1901年颁布改革谕旨时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事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清廷开启了最后一次挽救危亡的变革运动，鼓励发展工商业，设立资政院、咨议局，“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停止”等，但随着皇族内阁的出台终结了这场新政改革的命运。然而随着新政的推行，“改革的回归，民主化过程得以重新恢复并迅速走上正轨、达到高潮”。

在这种状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不仅大大突破了传统“夷夏”思想观念，并将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作为批判的对象。如针对中国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孙中山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还对中国传统旧道德提出了强烈批评，“中国之积弱不振，其根源乃是起自道德方面的”。其结果，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将清政府推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革命的不彻底性最终导致了辛亥硕果的旁落，民主共和内容更多地流于形式。对于这样的结果或由众多原因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完全摆脱“夷夏观”思想影响，没有做好“拿来主义”这篇大文章，应是原因之一。

“夷夏观”思想在近代历史中的变迁结局告诉我们，作为中国古代曾经是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物的“夷夏”思想，使中国长期居于优越的地理文化意识，将华夏与域外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并使其渐渐落伍，以致近代世界文明出现并与中华文明碰撞时，对“夷夏观”传统思想构成了严重冲击。对此，近代时人不知所措，甚至不再那么自信，不得不重新认识华夏与世界的关系，因而“师夷”“维新”与“民主共和”轮番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无论清朝洋务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更多地陷入了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以致改良与革命都没有成功。总之，作为传统文化思想必须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永续的生命力，紧跟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有所思

“不相干”背后的相干

□ 游宇明

光绪年间，四川有一个担任把总的强盗坏事干尽，但说来也怪，他无数次被拘捕，最后总是获释，每次获释都是乡民到官府作揖磕头哀求担保才得以实现的。岑春煊做四川总督时有心为民除害，秘密派下属拘捕此人。没想到消息很快走漏，尾随求保释放这个盗窃犯的人绵延数里路。岑春煊不为所扰，一等人犯押到，便布置将其枭首示众。岑氏有一点很不解：这个大盗害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大家还肯为他作保呢？周围的民众告诉他：我们其实受尽了这个强盗的祸害，只是过去的官府太怕事，逮捕以后没过多久就将其放了。缉捕时如果我们不为他求情，出狱后他就变本加厉伤害我们。岑春煊大吃了一惊。

同治六年（1867年），浙江海宁人陈其元受命代理南汇县令，巡抚与布政使要求他及时组织掩埋暴露的尸体。陈其元这个人办事非常敬业，他亲自督促董事、保长等办理此事，三个月一共掩埋了4万余棺，当地的青砖、石灰等使用殆尽。时近年底，尚有万余棺没有掩埋，或是因为亡者的子孙在外，无人作主，或是因为方位不利，暂时搁置。陈氏据实向朝廷禀报，结果受到申斥。另一个县只安葬尸体1700余棺，却报告境内完全葬尽，得到的评语是办理认真，记大功表彰。其实，陈氏的幕僚最初起草报告时也说了掩埋净尽，但陈其元考虑到如果这样汇报，下一年不用掩埋，万余未葬者依然还是暴露于野，肯定会带来疾病，因此，他选择了说出实情。没想到干实事却受到惩罚。

同治初年，山西有一个姓杜的人家极其富裕，妯娌争产，两人连年累月地打官司，谁也不让谁。该省官员从州县之吏到按察使、巡抚个个发了大财。按察使瑞昌吃了原告吃被告，所得最多。离开时，银子多得无法携带，只好在省城以12∶1的比率将银子换成金子，一时之间，省城的黄金几乎都被瑞昌一个人换完，瑞昌也因此得了个“黄金贼”的称呼。

上述故事，一个说的是坏人作恶，受害者不敢怒更不敢言，一个讲的是皇家统治者如何评价下级，一个涉及皇权时代的司法腐败。三者表面上毫不相干，它们的当事人也未必有多少勾连，但仔细一想，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内在的逻辑联系。四川大盗之所以有恃无恐、胡作非为，无非是因为有地方官包庇。而地方官为什么要包庇呢？一个可能是他们想做太平官，混几年就回京城；更大的可能是收受了大盗的贿赂，为了控制大盗，得“留水养鱼”。同治年代的山西司法界腐败至极，小官小捞，大官大捞，少数人甚至贪腐到让人发指的地步。这些地方官们为何如此胆大包天呢？原因只有一个：皇家人高高在上，只知道在深宫中听汇报，而不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经常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贪腐官员随便用点心计就可以将其蒙骗。

陈其元的委屈也好，四川、山西民众的被欺压、被剥夺也罢，其实都是皇权体制病症的一种折射。

两代学者对话“中国式奋斗”

本报讯（记者　曹颖新）大型纪录片《中国式奋斗》播出后，影响和讨论超出了影视领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月13日晚，北京团市委、求是全媒体发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单位在天幕新彩云影城报告厅举办“中国式奋斗：两代学者的对话”主题研讨会，邀请著名学者潘维、张颐武教授，青年学者田改伟、何建宇、鄢一龙等从不同角度阐释自己理解的“中国式奋斗”。

张颐武认为，《中国式奋斗》用镜头展示青年人的生活、梦想和追求，是一部有力量的纪录片，当代青年找到奋斗的支点后，要将脚踏实地和“高思在云”相结合，向着更高远的目标努力。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田改伟结合大量基层调研实例，论述了基层党组织通过破解发展难题，发挥在“中国式奋斗”中的作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建宇表达了对《中国式奋斗》纪录片的“感动和感谢”，结合“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论述了社会治理中“精准精细”的重要性；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阐述了“赋能型国家规划与中国式奋斗”，提出五年规划是人民共识、共建、共享的规划，人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在规划中体现了集体的、接力的奋斗。

最后，潘维与青年分享了“我的关于奋斗的感想”，从“为出色而奋斗与为生活而奋斗”“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个体奋斗与群体质量”“为组织起来而奋斗”四个角度娓娓道来，认为群团组织要重视普通群众的平凡奋斗，重视解决群众精神的和实际的需求，提升组织和服务的扁平化水平。

《中国式奋斗》纪录片基于“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10.8万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围绕7个群体普通青年的故事拍摄，包括《漂着的梦想》（“北漂”艺术青年）、《创造的人生》（在京创业青年）、《“光环”的背后》（机关事业单位青年）、《守护的价值》（媒体从业青年）、《燃烧的火炬》（青年教师）、《脚下的土地》（农业青年）、《梦想的起点》（在京外国青年）等7集。

学诗使人“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 梅敬忠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惜花之情中，平添了许多人生感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们登楼观景时，自然流露出豪迈俊爽的哲理诗情。“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不管人生道路多么坎坷，也依然信念坚定、志存高远、勇于担当、乐观进取。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如烟往事的美丽哀愁里，依然透射出高洁理想的光芒。人们儿时的吟诵，长大后仍旧记忆犹新，而且历久弥新。这就是国学宝库中古典诗歌艺术的特殊魅力。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人自古崇尚“诗意地栖居”，诗歌的传统悠久、丰厚而魅力无穷。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诗的品赏与诗的创作，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

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丰厚诗教传统的国度。不同于西哲柏拉图极端鄙视诗人并将其逐出理想国之举，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倒是特别重视诗人的创作努力，且极力强调诗歌有其不可取代的教化作用。

诗教传统源自儒家文化，经由历代儒家经典作家的解读，借助统治阶级为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需要而大力倡导，不断获取长足发展的生命活力。

“诗教”一词，初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经解》篇，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其基本观点是强调文艺应该为而且可以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甚至能够有效地为人的修身养性而达致道德完善服务。因此，所谓“诗教”，不过是以诗歌（文艺）形式来对人进行教化的约称，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以文化人的国家德治教育活动。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言志”是诗教源头的理论阐释。先秦时代的诸侯卿大夫，在交往中“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战国时代，“赋诗言志”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时必须熟练掌握的一种工具与手段。

诗教的核心概念还有“尽美尽善”说、“思无邪”说以及“兴观群怨”说等。

“温柔敦厚”也是诗教传统中对诗歌创作规范的描述。它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怨而不怒”等。

明志言情乃为诗。关于“诗言志”还是“诗缘情”，一直都存在分歧。表面上看，儒家诗教传统只重言志教化，排斥情感的酣畅表达；实际上，孔子诗教思想中也有讲求情志统一、以情明志、以文达意的积极主张。汉儒经典《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明确提出美刺谏讽说，完整阐述“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的真谛，将情与志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肯定了文艺的抒情性特质。

宋代朱熹主张遵循道统，弘扬“诗言志”理念，旨在建构“文道一贯”的“文统”。但他不同于二程所说的“作文害道”“学诗妨事”，反倒强调诗文创作的合理性，认为在充分体现义理的前提下，其文词愈美愈好。他正是以自身的理学功力和诗文创作实绩，创造性地传承了儒家诗教主旨，极大地丰富了诗教传统的内涵，延续并拓展了诗教的影响力。

清初王夫之主张“言志”与“缘情”的有机结合。他强调发挥“兴观群怨”的功用，肯定“以意为主”，提倡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他对诗歌艺术方法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大大提升了诗教传统中审美抒情的比重。

清代沈德潜特别强调诗歌的道德教化作用，在提倡“温柔敦厚”为主旨的儒家诗教的同时，而又主张追求诗歌艺术的“格调”之美。他极力提倡学习唐诗，注重研习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这就大大抵消了诗教传统实施中情志分离的流弊，使得“关乎教化、温柔敦厚、吟咏性情、比兴连类”成为正统儒家诗论的四大基本观点。其中的“关乎教化”与“吟咏性情”，可称是儒家诗教传统的两大支柱。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代社会在官德培养与相关制度设计中，特别注意诗教传统功能的发挥。作为个体的官员乃至君王，也把诗情的涵养当作须臾不可或缺的修为和人生功课。

古代诗教传统能否进行现代转型，使之服务于当代文艺发展与文化建设事业？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上述历代经典作家的探索实践，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读书学习，尤其要阅读一些文学作品。他明确指出，“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诗教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此论将情、志、人三者有机统一于对古典诗歌精神气韵的学习与鉴赏实践，为涵养人格魅力、提升干部素质，乃至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治理水平，寻找到了又一条有效的修养修为之道。

遥想当年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的一首《沁园春·雪》，引发国统区轰动效应，震怒蒋家王朝，倾倒社会贤达，毕现帮闲文人窘态与丑态，所谓笔扫千军、能顶百万兵之喻，亦不为过也。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人物的诗词创作实践及其作品，至今仍然散发着感人至深的思想、艺术与人格的魅力，即是对诗教传统生命力及其现代转型可能性的最好注脚。

持之以恒的国学经典名著教学，包括诗词歌赋鉴赏，对于干部提升自身修养水平，提高执政能力，乃至增强文化自信和对国家的文化认同感，能够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文化新论

